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YU XIANMU

后期资助项目

朱熹礼乐哲学 思想研究

冯 兵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朱熹礼乐哲学 思想研究

冯 兵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 / 冯兵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201-4495-7

I. ①朱… II. ①冯… III. ①朱熹(1130-1200)-礼乐-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7449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

著 者 / 冯 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文稿编辑 / 王玉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644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495-7

定 价 / 1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冯兵

男，1975年生，重庆奉节人，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孔孟学刊》执行主编。中国朱子学会、闽学会理事，厦门工学院国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儒家礼乐哲学、朱子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曾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学术奖项，并入选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从礼、理会通的角度，将经学研究、哲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礼乐哲学”“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等新的学术概念，从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方面对朱子礼学的哲学体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诠释与建构。作者认为，礼学与理学是朱熹思想王国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令朱熹的思想既有精密深邃的形上学建构，也有确凿可信的工夫论依据，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自序

拙著《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是在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关于书名，我先前一直在《朱子礼学的义理世界》与《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两者之间犹豫不定，因为前者较为四平八稳，而后者提出了“礼乐哲学”这一新的概念，我比较担心是否能够为人所接受。但一方面好在博士学位论文顺利地通过外审和答辩，有幸得到了评审与答辩专家们的认可与鼓励，并先后获得校级和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让我多少有了些信心；另一方面，自2010年我从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参加工作以来，虽然其间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芜杂的家庭琐事也分散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不过我一直在不懈地完善和修正自己对“礼乐哲学”的理解，亦曾以专文《礼乐哲学论纲》（刊于《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对之进行过阐述。尽管仍然不够成熟，但我自认为自己的相关思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这就是促使我大胆沿用原题的根本动因。另外，就朱熹而言，作为我国中世纪颇具代表性的哲学与经学大家，他对礼乐经典的义理化阐释以及对礼乐实践的相关思考与探索，也足以构成一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礼乐哲学思想体系，并对儒家礼学在今天的复兴以及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等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方法层面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启示。因此，对之展开系统深入的探讨是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关于本书的选题，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书名中“礼乐哲学”这一颇具新意的概念最早是我在向詹石窗教授请教博士论文选题时，詹师帮我敲定的。在2008年下学期，我的博士导师乐爱国教授建议我从朱熹的礼学思想入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但由于我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入手，应该与传统的经学研究或者思想史研究在方法和视域等方面均有所区别，加上我涉足礼经学的时间短，也有扬长避短的必要，所以在选题与具体的研究写作方面就必须突出其哲学蕴涵与哲学学科属性。（当然，我们也并非要刻意避开训诂与考据层面的工作。事实上，若要尽

可能准确地展开关于朱子礼乐之学的哲学诠释及其体系建构，恰当的训诂与考据仍是必须的。)为此我穷思苦索却不得其要，因此不断地烦扰乐师与詹师，向他们讨教和交流想法。有一天晚上我和詹师打电话又提到这个问题，他突然说，要不用一个新概念——“礼乐哲学”吧？一时间我有如醍醐灌顶，欣喜不已，这个选题不仅富于新意，而且极具概括性。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选题固然新颖、有价值，但如何论证“礼乐哲学”以使之成功确立起来，则是很关键也是很有难度的，而这却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谁也无法操刀代劳。如今，面对这一挑战我已硬扛了几个年头，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必须对詹师在这方面的帮助予以说明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另外，在拙文《礼乐哲学论纲》中，我将“礼乐哲学”的基本内涵大体分列为“礼乐自然哲学”“礼乐宗教哲学”“礼乐道德哲学”“礼乐政治哲学”“礼乐伦理美学”与“礼乐诠释思想”等数个范畴，与拙著中“礼乐形上学”“礼乐价值论”“礼乐实践观”的划分看似有较大不同，在此我想稍作解释。首先，我以为“三礼”是研究礼乐哲学的核心文献依据，其他经、史、子、集中的相关思想内容次之，因此，作为专门探讨礼乐哲学的概念、性质与基本内涵等的专文，《礼乐哲学论纲》也就主要是针对“三礼”展开。而《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主要是针对朱熹礼学思想中的哲学意蕴进行梳理、总结和升华提炼，是礼乐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对象与主要文献依据与《礼乐哲学论纲》一文不同，为了因应朱熹礼学思想的实际情况，故此拙著做了这一调整。其次，就拙著《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对朱熹的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层面的探讨也基本含括了礼乐自然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诠释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两者对“礼乐哲学”内涵的界定并无实质上的抵牾，而是互通互涵、相辅相成的。

以上是对本书中的相关问题所作的简要说明。

由于笔者的学养有限，对礼学与理学（朱子学）均不敢妄言熟稔，更遑论通达，虽然对“礼乐哲学”的概念与范畴体系做了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对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亦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分析、总结，但粗疏错漏之处必然不少，倘若能够得到方家大德的拨冗指教，鄙人将不胜感激！

目 录

导 论	1
一 选题缘起	2
二 礼乐经学的发展概况	7
三 朱熹的礼乐著述概况	20
第一章 礼乐与“礼乐哲学”	28
第一节 礼乐的起源	28
第二节 礼乐的人文升华	35
第三节 “礼乐哲学”的基本内涵	45
小 结	57
第二章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背景	60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	60
第二节 学术思想背景	69
小 结	82
第三章 朱熹的礼乐形上学	85
第一节 礼乐理气论	85
第二节 礼乐鬼神论	110
第三节 礼乐文质论	136
小 结	153
第四章 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155
第一节 “仁”	155
第二节 “敬”与“和”	170
第三节 “义”与“利”	188
小 结	211

第五章 朱熹的礼乐实践观	213
第一节 礼乐的传承与修订	213
第二节 礼乐日常生活实践观	228
第三节 礼乐政治实践观	247
小 结	269
第六章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特征	271
第一节 朱熹礼乐哲学经典诠释的特征	271
第二节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义理特征	285
小 结	298
第七章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299
第一节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何以可能	299
第二节 传统礼乐实践原则的现代启示	301
第三节 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的启示	307
小 结	315
结 语	317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31

导 论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被称为“礼乐文化”，中华文明也被称为“礼乐文明”，可见礼乐正是成就华夏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元素。我国的礼乐文化/文明传统以三代以来的儒家礼乐思想为主体，旁及其他的先秦诸子和秦汉以降的佛教、道教等宗教礼乐思想及相关文化传统。但作为礼乐文化之主体的礼乐，却不可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个体或集体的仪式规范和艺术行为，它不仅仅是华夏文化的一种符号象征，更是一种意义载体。礼乐（主要是指儒家的礼乐）承载并凝缩了华夏民族最优秀的生存智慧，也具备了充分的人文理性，内蕴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且自成体系，在此我们可名之为“礼乐哲学”。

儒家通常所称的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既指合于儒家价值理念的系列治国原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中的典章仪制，又包括了民众的道德修养法则与日常行为规范、仪式准则；狭义的礼，则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仪式准则和道德表现。同时，就礼、乐关系来说，由于早期的乐经失传，残存部分被附于礼经之内，因此单言礼时往往也就包含了乐在其中。“乐”同样亦有广、狭两义：早期经典文献中的乐多为广义，指的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狭义的乐近似今人所说的音乐，但仅指具有涵养德性与移风易俗功能的“德音”“雅乐”，并不包括“淫声”、“淫乐”或“邪音”。而以前述礼乐及其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体系，即可大体称之为礼学。礼乐哲学，也就正是以广义的礼乐为研究对象，以传统礼学研究与现代哲学研究两种范式相结合，针对中华礼乐文明之精髓进行的系统阐发与揭示。

传统礼乐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化，从史料来看，历经“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的“轴心突破”之后，至宋明时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首推朱熹。冯友兰先生评价朱熹及其理学道：“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他不仅学问渊博、慎思明辨，而

且留下了大量著作，仅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之多。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地位虽然遭到陆王‘心学’和清朝一些学者的挑战，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程朱的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① 朱熹可谓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起来的哲学王国体大思精，而其理论基础则主要是建立在对先秦经典的诠释和发挥之上，其中礼乐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在对礼乐经籍进行注解以及总结礼乐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阐发出来的哲学观念，即构成了其礼乐哲学思想。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对传统礼乐哲学观念体系的总结和继承；另一方面，他又结合理学这一理论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融入佛、老哲学的部分原理及思辨方式做出了创新。因此，朱熹礼乐哲学思想最终便呈现出了一种既与传统一脉相承又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面貌。它与理学有着很多交叉与重合的内容，并与理学相激相长，互为补充，共同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水平。

一 选题缘起

那么，我们为何要提出“礼乐哲学”这一概念并以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呢？

首先，我国传统礼乐有着丰富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它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化与文明的主体内涵。

《礼记·乐记》中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又说：“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将礼乐合称，并视二者的合而为一是经纬天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对此，南宋史学家郑樵就曾明确指出：“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② 在六经之中，礼与乐始终都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国古代的礼经与礼经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自战国以后，乐作为经的一种已经基本失传，但仍然有部分内容遗存在礼经之中，并随着礼经一道流传下来。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新世纪出版社，2004，第255页。

^② （宋）郑樵：《乐略·乐府总序》，《通志》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7，第625页。

自原始礼乐形成之后，到了西周与东周时期，礼乐具备了更为显著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①孔子对礼乐的整理和完善不遗余力，虽说是“述而不作”，但这个过程却是一个创新性诠释与重构的过程。孟子与荀子（主要是荀子）接过了孔子的工作，但更多的则是对礼乐的意义和社会功能进行理论的诠释与完善。他们对礼乐这一文化载体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体现出了先秦儒家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的哲学观照与体察，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精神超越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及学派也从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关注重心出发，于三代礼乐传统做出了新的诠释和理论重构。至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对礼乐的论述和发挥，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哲学与伦理学蕴涵。

在经学兴盛的两汉时期，学者们对儒家经籍的大规模训解、阐释和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字的烦琐训诂，两汉经学之“学”的本身相比先秦和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而言，并无太多高明的哲学性思辨与探索。到了两宋，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巅峰阶段，学风则为之一变，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们对“经”主要采取的是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并用而以义理阐释为主的解经方式，他们对礼乐本身所内蕴的哲学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论述。这一演化过程既对理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对礼乐本身的哲学意蕴做了部分消解、重构以及极大的补充，丰富并扩展了礼乐内在的哲学体系。传统礼乐经过两宋时期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具备了更加丰厚的哲学与伦理学的底蕴，对于自先秦以来的华夏礼乐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社会理想、伦理观念、行为方式、情感表现、审美倾向等，都或隐或显、潜移默化地带有礼乐文化的印痕”^②。

①（汉）司马迁：《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第1935页。

② 李宏峰：《礼乐张力下的音乐体认——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第1页。

其次，现阶段我们对传统礼乐有着重新认识并加以合理扬弃的必要。

事实上，中国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关于传统礼乐文化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自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的强力入侵，西学东渐，异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为了振兴国运，开始寻找中华民族积弱积贫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而适应于小农自然经济环境的传统礼乐文化在这一“历史上未有之大变局”中所体现出来的保守与落后，则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全面批判。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在历史观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古史辨派借鉴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历史观指出，中国原有的一套历史体系是层层累积的伪造成果，传统儒学所宣称的道统谱系完全子虚乌有，从而掀起了一场疑古思潮，基本否定了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后的新史学派采用西方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来剖析中国的历史形态，虽然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做出说明，但所采用的毕竟是适用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理论体系，并不能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给出合理解释。反而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牟宗三先生就认为：“中国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这整个的文化系统，从礼一面，即从其广度一面说，我将名之曰：礼乐型的文化系统，以与西方的宗教型的文化系统相区别。”^① 牟先生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华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并准确地从“广度一面”名之为“礼乐型的文化系统”，确认了礼乐文化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

而20世纪50~70年代末的这三十年间，传统礼乐文化始终是受到贬抑和批判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她更是被“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文革”结束，经党和政府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小心翼翼地试探、摸索，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逐渐

^① 牟宗三：《中国文化之特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第63~66页。

兴盛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和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流不断加深。出于经济贸易、出境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需要,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礼仪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各种西方礼仪的讲座、培训以及相关教材大量涌现。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刺激了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加大了对我国传统礼乐文化展开研究的力度。在这方面,大陆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如彭林、杨天宇、杨华、王锷、程奇立(丁鼎)、邹昌林、吕友仁、吴飞、王启发、龚建平、陆建华、刘丰、梅珍生等较有影响的学者^①。当然,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一个方面,引起学术界关注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对国际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深入思考,以及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充分认识等方面。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给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使得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令社会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两极分化严重、信仰危机、国民整体道德水平退化,等等。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愈加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地照搬西方的发展套路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发展形势。所以,许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具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传统礼乐文化,希望通过推陈出新,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文化资源,使之既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又能发展和促进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兴起“国学热”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综观当前学术界关于儒家传统礼乐的研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从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化人类学以及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转换等方面展开的,而对礼乐文化的文字载体——“三礼”原典及相关经学论著——所内蕴的哲学思想,或者以某一具体人物、流派或地域、历史时段等的礼乐经学与礼乐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对象,来进

^① 台湾则在老一辈的礼学家如高明等人谢世之后又以叶国良、林素英等较为人所瞩目。

行集中、深入的发掘与诠释,^① 相对礼乐哲学思想的精深与博大而言,则显得尚不够充分,这与之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展开这方面的广泛深入探讨,已是势在必行。

最后,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两宋时期,经过汉唐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 对此,陈戍国先生则强调道:“我国文化史上早有‘宋学’一名。宋学是耐人寻味的。关于两宋礼俗礼仪礼制的研究,应该是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宋学研究者如果忽视两宋的礼仪礼制研究,恐怕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做到透彻通达的。”^③ 刘丰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宋代的儒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理学,对儒学的心性内圣之学研究固然重要,但若是忽略了儒家的礼学这一制度外王之学,对

① 目前所见的只有少数几部较具代表性的专著,如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林安弘《儒家礼乐之道德思想》(天津出版社,1988)、王茜《〈礼记·乐记〉之道德形上学》(文史哲出版社,2002)、彭林《〈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勾承益《先秦礼学》(巴蜀书社,2002)、陆建华《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梅珍生《晚周礼的文质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成守勇《古典思想世界中的礼乐生活——以〈礼记〉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13)等,对我国早期礼学思想中的哲学意蕴从不同角度做出过较为系统的阐发,但基本集中于先秦与秦汉时期,而且主要是针对《礼记》展开。此外,虽有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天津出版社,1992)与《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与《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等综合性礼学与礼乐文化研究,以及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国立”编译馆,1999)、惠吉兴《宋代礼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刘丰《北宋礼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日〕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日本山根三芳《宋代礼说研究》(〔日〕株式会社溪水社,1995)、〔韩〕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王云云《朱熹礼学思想渊源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等礼学论著问世,但就秦汉以降的有关礼乐之哲学(礼乐哲学)思想展开专门和系统研究的,目前似乎尚未见到。

② 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转引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61页。

③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61页。

儒学的理解就不会完整。而且，历来有关儒家礼学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两汉礼学与清代礼学上，相对忽略了宋代礼学，而事实上宋代礼学的成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独具特色。^① 笔者则以为，要深入研究宋代的礼学，被视为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圣人的朱熹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其高明而又渊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他身后既以世俗化的形式被推广普及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又被提升到了官学的地位，统治学术思想界近千年时间。而朱熹一生对礼乐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三礼”的梳理和诠释更是看重，直到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在他的思想与学术中，关于礼乐的研究既是其学术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又是宋代经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它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朱熹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等方面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礼乐研究在朱熹整个学术体系和学术活动中所占的分量来看，对朱熹的礼乐思想进行哲学层面的梳理、提炼与诠释，在理学史与礼学史两个领域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正是出于对传统礼乐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价值、时代对礼乐研究的需要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促使我们选择了这一论题。

二 礼乐经学的发展概况

在朱熹一生的思想与学术活动当中，对礼乐的修订、阐释与实践活动可以说是相伴始终的，他也因此而留下了大量相关的著述以及由后人辑录整理出来的讲论。但由于整个传统礼乐，尤其是唐、宋两代礼乐的发展演化与之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故而我们在分梳朱熹的礼乐著述情况及其礼乐哲学思想时，就必须对之略作回顾。此外，又因为礼乐之“经”被政府法定为儒家“经典”而成为专门之“学”，乃是在汉代才基本完成的事情，^② 故而本文此处对于朱熹之前的礼乐“经学”所作出的历史分梳也就有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从汉代直至南宋朱熹的生平

① 详见刘丰著《北宋礼学史》之“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6页。

② 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